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段金生¹, 陈子牛²

(1. 云南民族大学 科技处, 云南 昆明 650504; 2.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冯子材、崧蕃、丁振铎;地方政局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3)02-0037-13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2.005

一、引言

晚清因其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时势,是近代史研究广泛关注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在研究资料、研究视角及论述深度等方面不乏有突破性的进展,并且一直方兴未艾。^①为求得王朝在内外交困中的延续,晚清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内部改革运动,均影响了晚清王朝发展的进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虽然最终宣告失败,但也为时人留下丰富的反思性内容和经验教训。清末新政在晚清七十余年图存求强的发展轨迹中,吸收了各方应对内外时局举措的经验教训及时代反思内容,在改革领域、深度及影响上都有极大的发展和变化。改革领域广,新政涉及政治制度、军事、文化、教育、经济、外交诸领域;改革力度深,新政关涉王朝由传统中央集权向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与发展;改革影响大,新政的举措影响至民国社会政治发展脉络。在某种程度上,清末新政是晚清统治者在面临巨大生死存亡危机下进行的变革运动,是最后一次主动改革的举措,是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次变化的关键分水岭。由于清末新政改革涉及领域扩大、力度增强,更亟须地方督抚的强力支持,地方政局形态自然也影响到新政实施的基础与效能。

在由传统中央专制集权制国家向近代共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多元的民族文化和经济结构等,边疆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势力侵逼王朝的前沿地带,各种内外矛盾交织,加剧了边疆社会政治形势的复杂化。云南地处西南边徼,本不与“外国发生关系”,自“法、英先后并越、缅始”,

* **【作者简介】**段金生,男,云南师宗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西南政治史、边疆民族史;陈子牛,男,河北路北人,云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西南政治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末新政在云贵的实践与近代边疆治理转型研究”(20AZS010)。

^① 关于晚清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民国时期就有研究者展开讨论,例如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就对湘淮军的崛起做了专题讨论。尤其1949年以来,海内外学者围绕晚清政治、财政、军事等领域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若干近代史或晚清、民国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均有涉及,相关论著较多,此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可参阅:段金生,贺江枫.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J].思想战线,2014,(4):20-31.

云南“商务、界务、路政、教案纷起”，^①在内忧外患交替的形势下，云南地方政局也颇不安定。在1900年，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并进而影响了紧随其后的清末新政在云南的实践。^②

冯子材与崧蕃矛盾公开化之时，正是清廷与列强关系陷入危局并演变为庚子事变之际，也是清末新政正式实施前夕地方军政场域复杂关系的呈现。冯子材参奏崧蕃，清廷中枢谕令丁振铎居间调查。虽然其后因庚子事变爆发及崧蕃调离云南，使这一事件不了了之，但细究其间之复杂经纬，却表明清廷实施新政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实施条件的脆弱性。这一共生互动的景象是晚清长期累积的各种关系交织的结果。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言，这也是新政最终陷于失败、清廷最终瓦解的重要原因和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这一政治争执及博弈，在呈现西南边疆军政局势复杂不安的同时，也表现了清廷中枢与地方互动关系的变化，中枢对边疆地方权势结构决策及影响逐渐减弱，这自然也对其后1901年开始的新政措施、效用形成了影响。关于清末新政及这一时期央地关系的研究，学术界探讨颇多。^③关于这一时期的云南地方政情，一些关涉云南近代史的通史性论著或专题著作对此均有讨论。^④具体到清代云南的督抚关系问题，许新民探讨了云南督抚同城的行政功效等。^⑤总体上，由于研究侧重或主旨的差异，现有研究成果对清末新政前夕云南军政主要人物政治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仍有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

根据《清代职官年表》的整理，崧蕃为满洲镶蓝旗人，出身科举仕宦家庭，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任云贵总督。丁振铎系河南罗山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擢云南巡抚。冯子材系广西钦州人，于光绪十三年（1887）任云南提督，但冯子材因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实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方回提督本任。^⑥应该说，3人任职交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1900年却爆发公开的矛盾冲突，以冯子材参奏蔡标为始，紧接着又参崧蕃，很快将云南地方军政3名主要官员均卷入其中，这一事件之中隐蕴及折射的复杂内涵，颇有研究的价值。分析这一事件中各方的言行，既可以呈现清末新政实施之前边疆地方形势的复杂性及面临的国内外政情，进而也可以对新政实施过程中在西南边疆的具体表现、效果及新政的最终结局进行理性反思。具体就本文所关注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南督抚间的矛盾和分歧，蒋金晖在关于冯子材的研究评价中对此虽略有涉及，但因论述主旨的侧重，对此并未过多展开。^⑦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在研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晚清政局及云南边疆面临的内外形势，在细致梳理冯子材参奏崧蕃事件中各方态度及行为的同时，重点分析各方言行背后隐藏的复杂经纬，探讨这一形态对其后清末新政在云南实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进一步充分揭示晚清政治的实态及晚清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① 牛鸿斌. 新纂云南通志: 第7辑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546.

② 有清一代, 规定总督掌“厘治军民, 综制文武, 察举官吏, 修饬封疆”, 巡抚掌“宣布德意, 抚安齐民, 修明政刑, 兴革利弊, 考核群吏, 会总督以诏废置”, 提督掌“巩固疆陲, 典领甲卒, 节制镇、协、营、汛, 课第殿最, 以听于总督”(参阅: 赵尔巽. 清史稿: 第1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336, 3389)。3个职官的设计, 本意有借此让各方互相牵制以防权势失衡, 但亦因此难以避免各方彼此争夺权力。

③ 刘伟、李细珠等学者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李细珠. 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刘伟、李细珠均在各自论著的“前言”部分对晚清央地关系及清末新政研究的发展脉络做了论述。限于篇幅, 此处不再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一一具列, 特此说明。

④ 较具代表性的论著有: 谢本书. 云南近代史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何耀华. 云南通史: 第5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⑤ 许新民. 清代后期云南封疆大吏的省情认知与国家治理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⑥ 钱实甫. 清代职官年表: 第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494, 1737, 2582, 2588.

⑦ 蒋金晖. 近代边疆危机视域下冯子材的历史地位述论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 111-117.

二、提臣与督臣矛盾爆发：冯子材参奏蔡标、崧蕃

光绪亲政后，清廷中枢围绕帝、后之间的派系分合不断演化。^①甲午战败加剧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同时也促使清政府反省自身统治的困境，统治阶层中的一批人物试图通过军事改革来提高清朝的实力并维护清朝的内外统治。在甲午战争之际，光绪帝就命胡燏棻兴练定武军，开始了最早的小站练兵。张之洞也于1895年在湖广总督任上，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式军队，被称为“自强军”。其后，清廷中枢还成立督办军务处。在内外压力及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清政府加快了军事改革的步伐。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1899年2月21日），清廷中枢再次表明加快军事改革、加强军队训练的态度。光绪谕令军机大臣，称“练兵为当今要务”，要求各省督抚各就本省财力，“妥定章程，认真办理”。各督抚要据实上奏各省“实能筹饷若干，练成几营，何人统率”，应“通筹妥议”练兵事务，并限在一月内迅即覆奏。为防止督抚及提督相互推诿，谕令强调，各督抚“均有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之责”，而提督、总兵则“为专阃大员”，对“兵事尤责无旁贷”。要求设有提督的省份，责成提督“统领通省各营”；未设有提督的省份，则应于“各镇中遴选熟谙军事之员，总司营务”。对于督抚职责，要“不时校阅”军队以“赏罚严明”。各省督抚、藩司对练兵一事要“妥筹协拨，奏明办理”，以“副朝廷讲求武备，谆谆告诫之意”。^②光绪此时虽在帝、后派系博弈中失败，但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一谕令，代表了清廷上下对编练新式军队的重视，也强调了提督在地方军务中的重要性。是年年底，清廷再次专门强调提督要加强对地方军务的统领，谕令要求“各省防营有提督省份，应责成提督统领”。^③清廷反复强调提督对地方防营军务的统领，既是出于对提督的职责要求，但或也折射出提督与总督在地方军备上颇有纠葛的状况。

对于清廷命各省督抚、提督加强练兵的谕令，笔者目前未看到云贵总督崧蕃等人具体回奏清廷的奏折，但冯子材于次年正月二十四日（1900年2月23日）的奏折中对此有过描述。冯氏在奏文中称，“前准云贵督臣崧蕃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谕，……应责成提督统领通省各营，总以痛改缺额蚀饷为第一要义，然后申明纪律，勤加训练”。接到谕令后，他于四月由大理赴省会昆明，与崧蕃会同酌商，认为云南地处极边且幅员辽阔，西、南两迤又均有强邻逼处，故“沿边择要设防，各营驻扎另行，若非提督亲往，逐处巡查，纸上空谈，终莫得其实”。于是2人商定，由提督分年巡查各营部队，具体以1年巡查迤东、迤南各营，以1年巡查迤西各营，以达到“边地情形，了如指掌”的效果。冯子材还称与崧蕃会商一致后，他于五月从南路巡阅临安、开化、广南3府辖境，于十月回省后将“查阅南防各营，以及边氓启衅原由咨商督抚臣会奏”，十一月则回大理驻防部属营制。对于冯氏所奏，朱批为“知道了，办理尚属认真，仍着随时稽察，如有缺额蚀饷等弊，即行从严参办。”^④冯子材在奏折中表现了对巡边的高度重视，朱批则用词平和，未对其予以特别的鼓励，属于一般性事务性的指示。冯子材在奏折行文中，强调与督抚之间的沟通，虽然没有呈现出二者协商的具体情形，但说明彼此意见尚属一致。然而，事实上他与崧蕃早有分歧。在此折之前的十余日，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三日，因崧蕃奏奖开化镇总兵蔡标一事，冯氏向清廷参奏了崧蕃。

崧蕃为何奏奖蔡标，要从1897年发生的“乐里教案”谈起。1897年，天地会首领游维翰枪杀法国传教士及其随从，引起中法交涉，史称“乐里教案”。“乐里教案”发生后，清廷派兵“围剿”游维翰，引

① 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② 清实录：第57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752。

③ 云贵总督崧蕃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28。

④ 云南提督统领通省防营冯子材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36-837。

发滇、桂、黔三省交界会党起义,冲击着西南边疆社会秩序的安定。^①为安定西南边疆地方社会秩序,清廷中枢要求“崧蕃、黄槐森电飭防营,合力会剿,务期迅速剪除,毋任蔓延为患。”^②根据这一要求,崧蕃命令蔡标率领前往镇压,并与粤、黔协商制定了“各清各界”的方针政策。^③经过约一年的时间,镇压行动取得一定成效,崧蕃亦因此奏请奖赏蔡标等人。^④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崧蕃正式奏请清廷准许蔡标进京陛见。根据崧蕃所述,蔡标时任记名提督、云南开化镇总兵。蔡氏于咸丰六年(1856)投效军营,曾随同岑毓英转战滇、黔、川、闽等省,后以提督记名简放,于光绪七年(1881)简授云南开化镇总兵。中法战争之后,又奉委署理云南提督,在任十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奉飭仍回开化镇总兵本任。崧蕃向清廷奏请,称:“伏念总兵身历戎行四十余载,屡受朝廷厚恩,尚未入觐天颜,午夜思维,难安寝馈。今幸滇边内地已无匪踪,地方亦照常安静,正可趋赴阙廷,跪聆圣训,俾伸积年依恋之忱等情,呈请代奏前来”。称赞蔡标“老成持重,谋略精详”,其因在任日久而“陈请陛见,实系出于至诚”。崧蕃所请,得到清廷同意,朱批言:“着来见”。^⑤然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900年2月12日),崧蕃再上附片,称蔡标在广南、邱北等处督办“剿匪事务”一年,能够“身历瘴乡,督率各营认真剿捕,赏罚亦极公允,以致各员踊跃从事,擒斩甚多,沿边赖以安静,游匪因而敛迹”,对其“未便没其勤劳”,恳请清廷赏给蔡标头品顶戴。对此,朱批仅言:“另有旨”。^⑥清廷中枢前面已允蔡氏入京陛见,此时则未表态同意所请,或预示事情正另有变化。

正在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900年2月12日)崧蕃请奖给蔡标头品顶戴的当天,冯子材上奏弹劾蔡标,与崧蕃的矛盾正式公开。冯氏在奏折开头就言:“奏为特参淫乱荒谬不职大员以儆官邪而肃营务,谨胪列各款专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称蔡标“淫乱荒谬,劣迹多端,实于营伍地方大有关碍”,言其早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1899年11月30日)已在省城“开明该总兵蔡标劣迹”,并“咨请督臣崧蕃会参”。但是,他却于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1900年2月8日)接到崧蕃咨文,要其为蔡标“吁恳陛见一折”出具“老成持重,谋略精详”的考语,与其上年“咨参各款大相径庭”。从冯氏此语判断,早在两个月之前,他已向崧蕃陈述了对蔡标劣迹的调查。然而,崧蕃仍然向清廷中枢为蔡标请奖,说明崧蕃并不认同冯氏对蔡标的评语。冯子材参奏蔡标的劣迹共11条,主要包括:一是蔡标由开化带兵,办理广南游匪,但“不实心任事”。二是到广南即安居于江西会馆“演戏月余”,但对“一切军务,全不关心”,演戏等费则“尽勒令辖下各防营均摊”。三是蔡标“素慕广南夷女貌美”,更以收取“义女”的名义骗诱“各处夷民妇女四五十口”,所带亲兵亦相效,以致“怨声载道”而其置若罔闻。四是不理军务,虚冒战功。五是蔡标嗜好颇深,“日以淫乐为事”,擅作威福,绅民多有不平。六是逼索下属临平后营管带彭惠俊每月呈缴勇饷三十分,导致勇多缺额。七是其侄蔡小四在开广地方为哥老会会首,他日蔡小四“聚众若至数万”,则可里应外合导致“云南必陷”。八是所到之处,均有结纳,“情谊隆重,以为袒护地步”。九是蔡标在云南提督署任时,勒索各营管带每月呈缴勇饷。十是蔡标前在云南提督署任,“生辰及各令节神诞均演戏宴会”,而费用俱系摊派防、绿各营员弁兵勇。十一是蔡标强娶马姓之女。冯子材还对崧蕃“滥保”蔡标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崧蕃不愿与其会参蔡标,反而对蔡标请奖的缘由,是因崧蕃与蔡标两人存在“翁婿”关系,即“蔡标之爱妾马氏曾拜督臣之妻认为义母”,故“翁婿情重,特为袒

① 徐舸. 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31-36.

② 清实录: 第 57 册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87.

③ 清实录: 第 57 册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91.

④ 清实录: 第 57 册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004.

⑤ 云贵总督崧蕃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 47 辑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9-30.

⑥ 云贵总督崧蕃等折附片(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 47 辑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75.

护”。并称其在省城时,崧蕃曾隐隐再三向其代蔡标说情。冯氏表示“非敢有违督臣之意”,但“身膺专阃,若稍有瞻徇,相为蒙蔽,则众皆效尤,大局何堪,再四思维,不敢缄默,以蹈欺罔之罪”,故不得不参。冯氏参奏内容,完全与崧蕃之意相反,清廷中枢显然一时难以答复,仅朱批“另有旨”。^①

冯子材弹劾的本意并非仅针对蔡标本人,主要是指向云贵总督崧蕃。在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900年2月12日)所上弹劾蔡标奏折的最后,冯氏称崧蕃身为封疆大吏,本应统率全省文武,却“党同妄保,习为欺蒙,似亦罪有难辞”。^②意之所指,溢于言表。果然,不及一月,冯氏就正式弹劾崧蕃。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四日(1900年3月4日),冯子材正式弹劾崧蕃多报营队编制而吃空饷,言“封疆大吏侵蚀军饷甚巨,捏报裁营,辜负天恩”。在奏折中,冯氏称为“整军经武,力挽颓风”以图“自富自强之计”,他要求云南全省营务处“开局各营清折,务在营归实数,饷不虚糜,并将各镇分统各营管带、哨弁衔名,兵数以及驻扎处所分别注明”,通省共计48营。然而,其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1900年2月18日),接到营务处咨会,称奉云贵督臣崧蕃之令,“由驿具奏裁去战兵两营”。此两营,一系驻防腾越厅城之腾永中营,一系驻防开化府长岭冈等处之临平中营。冯氏对照营务处所给清折,发现腾永仅有前、后、左、右四营,临平则只有左、后两营,两地均无中营。1899年,他巡阅时曾途经“临平中营”所驻扎的长岭冈等处,该地“深林茂箐,不特无此中营,亦并人民稀少”。而腾永中营,也是“凭空接篆”:驻防腾越厅城总兵为张松林,向驻镇署,其“前营管带则总兵邓秋高也。后营管带则游击王有义也。左营管带则游击蔡凯臣也。右营管带则参将赵伟也”,均“有册可查,有目共睹,又何尝有腾永中营”。冯子材称两营“添自何年不可知,何人管带不可识”,每年却需发饷约两万三千两。若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崧蕃接任滇督算起,其蚀饷金额已超十万两。崧蕃于此时“裁撤”腾永中营及临平中营,其目的不过是妄图“弥缝”以便应付清廷查阅。冯子材还指责云南布政使林绍年与善后局、营务处瞻徇情面,希图“通同作弊”,以两营军饷“逢迎长官,朦混朝廷”,崧蕃则“利令智昏,至于此极”。^③

然而,此时清廷中枢经历戊戌政变后,虽然慈禧权力更加集中,但朝野各派的对立亦更为激烈,加以立储之议,引发内外关注,甚至列强干涉,各方矛盾交汇、博弈,实无精力顾及此事。^④或是之故,冯子材上述两奏的参劾内容不可谓不具体,并均直接指向崧蕃,任何正常的执政者均会对此有所察觉,但朱批仅言“另有旨”^⑤。此或另有他意,或是无力顾及的暂缓之举,实难清晰道明。

事实上,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清廷就命崧蕃进京陛见,而以云南巡抚丁振铎兼署云贵总督。^⑥或因缘巧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900年2月12日),崧蕃正式向丁振铎“交卸督篆”,同日向清廷上附片保蔡标头品顶戴。^⑦而如前述,也在当日,冯子材参奏蔡标。时间之交汇,不可不谓机巧至极。

冯子材在参劾蔡标及崧蕃的时机选择上,也不能不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是基于前述1899年

① 云南提督冯子材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8-90.

② 云南提督冯子材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90.

③ 云南提督统领通省防营冯子材折(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2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6-7.

④ 此时清朝中枢内外的复杂政局,可参阅: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2-55.

⑤ 云南提督统领通省防营冯子材折(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2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

⑥ 清实录:第57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983.

⑦ 云贵提督统领通省防营冯子材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50.

清廷中枢就地方督抚与提督在练兵职责安排的调整。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四日(1900年3月4日),冯氏在弹劾崧蕃的奏折中,开篇就言“滇省防营积弊太甚”。原因为何?对此,冯氏称:“一切委任分统、管带,悉归督臣主政,此向章也”,而提督“事权不属,不敢与闻”。直至前已述及的,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1899年2月21日)上谕指示练兵之事应责成提督统领通省各营,所需饷项则由提督与该省督抚、藩司“妥筹协拨奏明办理”。这对提督职责有了明确调整,冯氏才有权“严肃任事”,整肃“缺额、蚀饷等弊”。^①上引冯氏自身所言,实则隐含有其对云贵总督崧蕃事权专一的职责或早有不满意,而清廷中枢要求提督负统领全省各营之责,让其有了适当之理由。其次,是冯子材早就认为崧蕃处事有失公允。冯子材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日(1900年6月6日)向清廷上奏,其中直言对崧蕃请奖蔡标一事的不满。冯氏称,其与崧蕃制定巡查军队办法后,便带领所部出巡校阅,所带兵“身历蛮烟瘴雨、水土恶毒、道路奇险,不敢告劳。途中大半染瘴,死亡相继,几令医药无灵,其幸存者又能力疾从公,往返经年,尚无一毫懈志”。巡阅途中听闻法国人因修建滇越铁路与蒙自人民发生冲突,又带领随巡部队星夜驰往协调各方,“全活边氓以数千计”,更由此杜绝了法国“欲举兵寻衅”的借口。对“蒙自迅弥边关大患”这一“异常”之功,冯氏嗣后曾“咨督臣崧蕃开单请奖”,但崧蕃心胸狭窄,竟不获其“一请奖叙”,反而“滥保”蔡标。冯氏认为崧蕃所为不能不使自己所部“向隅”。^②再次,冯子材此时参劾崧蕃,也是为了彰显提督职权。前已述及,冯子材认为云南善后局、营务处两机构的权势太重,总督垄断了云南全省防营管带等营官任免权。这无疑削弱了冯子材作为云南提督的权力。总督职权过重,而善后局、营务处又根据哨弁或管带职位的不同而索取白银,而“所索贿银,均系暗送暗收,督臣、处局、幕友、家丁通同作弊以应”,被索官员此后又要通过克扣下属来弥补自己行贿所花的费用。这些情况的产生,崧蕃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③这一论述,说明冯氏对此前云南军政权力格局形态早有不满意。当然,要观察的是,崧蕃入京早经明示,崧蕃又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900年2月12日)将总督大印交付丁振铎,即将赴京。笔者虽未见冯子材对参劾崧蕃具体时机选择上的相关资料,但在此微妙时刻弹劾,用意则颇显幽深。

自光绪亲政后,清廷中枢的派系权力博弈日趋复杂,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然大权旁落,但新一轮的权力结构也正在重新调整。1900年前后,国内又发生义和团运动,很快引发庚子事变,而东南各督抚实行自保之策。这一多元交织的复杂景象,使清廷中枢焦头烂额,实无过多精力思考对冯子材参劾的应对之策。此时,云南地方另一主要角色云南巡抚丁振铎,不论是其职责本身,还是从清廷中枢的决策选择上,均需要其出面对总督、提督之间的矛盾进行调查。

三、抚臣的调和:丁振铎的调查

提臣弹劾督臣,本应为清廷中枢所格外重视。然而,清廷此时正面临更严峻的内外问题,对此显然无力顾及。义和团运动不断发展,与列强矛盾加剧,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博弈激烈,清廷中枢的运作也因之受到影响。对于冯氏的两次参劾,朱批均言“另有旨”,但一直不见清廷采取具体动作。时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1900年5月2日),清廷谕令丁振铎就冯子材参劾崧蕃袒护蔡标、滇省善后局及营务处“权势太重”等事,要“秉公查明,据实奏覆,毋稍偏徇”。^④此时,不仅清廷中枢政治运转大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云南边疆地方社会政治环境在内外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之下也受到影响。直到光绪二十六年

① 云南提督统领通省防营冯子材折(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2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6.

② 云贵提督统领通省防营冯子材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54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49-850.

③ 云贵提督冯子材折附片(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91.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5.

五月四日(1900年5月31日),丁振铎才收到清廷中枢要求其核查冯子材参奏崧蕃各款的军机大臣字寄内容。^①而在上谕核查指示的次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五日(1900年5月3日),署蒙自关道刘春霖通过电报向丁振铎汇报了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私运军火强闯蒙自海关引发冲突,很快“越南总督都梅调兵数千,填札保胜、龙膊一带,逼近滇境”,^②滇越边境形势顿形紧张,这使丁振铎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法交涉、维系省城安定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时还要整顿军队以防发生不测。

在此内外交困的情境中,丁振铎分派刘春霖及大理府知府景春就近对冯子材参奏崧蕃各款分别展开密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1900年9月23日),丁氏根据刘、景调查参奏各款的情况,向清廷复奏。^③

首先,就蔡标在广南任职时被参的情况做了回奏。其一,就蔡标带兵办理广南游匪“并不实心”,安居江西会馆演戏月余,费用勒索各防营均摊一事。调查认为,蔡标系由开化先抵广南,与粤西接壤的者歪(今广南县坝美镇者歪村一带)驻扎,督饬“各营勇先将北路土游各匪搜捕清静”,于次年2月始转驻广南府城,并借住于江西会馆。蔡氏目的是“居中策应,堵剿东南两路游匪”。对于上述行为,蔡氏“均有禀牍可稽”,而并非“耽于宴乐”。其二,就蔡标在江西会馆演戏一月之事。调查称,蔡氏在江西会馆演戏一事,是当时广南地方“瘟疫盛行”,当地百姓为祈福消灾而自行雇人演戏。而蔡标鉴于“弁兵死亡甚多”,故亦“捐廉演戏三日”,此举所需钱财有限,也不需要勒索下属,故“原参所指自系误会”,冯子材所奏不实。其三,就蔡标“计诱者歪夷民妇女四五十口为义女,日夜在会馆饮宴淫乐”一事。丁振铎在奏折中称,其时当地“土人窝藏游匪”,若派兵搜捕则“消息早通,难于就获”。有鉴于此,蔡标为拉拢当地各寨首领,遂利相诱,令各寨首领暗中相助官军。当地民众亦长期有“以见官为荣,往往途遇长官路过,辄携子女罗拜前求福”之习惯,纵使当地上层人士亦使子女“求拜该总兵膝下”,蔡标为笼络当地民众,对此类事情概为应许。如此,则常有当地妇女前往蔡标所住江西会馆看戏,会馆内仅有右厢房三间分别用作蔡标卧室、文案室和客厅,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不可能发生“伙为淫乐”之事。认为冯氏“原参所指始传闻之过当”。其四,就蔡标“军令不肃”,亲兵“计引良家妇女,并开场聚赌”一事。丁振铎称“兵勇暗地嫖赌,事所不免”,但“未闻敢于在营开场者”。蔡标上一年有严肃整顿军纪并“严行禁赌”的具体行为,“军令容有未肃,实未置若罔闻”。所称“计诱良家妇女”则“无凭查究”。其五,就蔡标“不理军务,剥隘一带,贼风愈炽”,且“饰禀冒功”之事。调查称蔡标曾“带兵督剿,迭经击退,商路始通”,且生擒游匪百数十名,均解经广南府讯供正法有案。认为“战功之非饰冒,似属可信”。其六,就蔡标“日以淫乐为事”,巡捕黄元吉“擅作威福”,强占张八之妻且反诬张八“送县监禁”之事。调查认为并不属实,称“至其如何窃权,擅作威福,查无确据”。其七,就蔡标逼索临平后营管带彭惠俊月缴勇饷三十分导致“勇多缺额”之事。调查认为彭惠俊所带营勇原本足数,嗣后移驻普厅边地,则因“瘴疫逃亡”而至缺额。故“缺额有因,缴饷亦不实”。其八,就蔡标纵容其侄蔡小四为哥老会会首一事。丁振铎在奏折中称,蔡标对蔡小四向来管理严格,因为蔡小四“赋性横暴,时与丁壮生事”而早将其遣回。其时,蔡小四也仅15岁,根本不可能“结党至数千数万”。其九,就蔡标“所到之处,均有结纳”之事。丁振铎在奏折中称,“究竟该总兵与何人结纳,图何人袒护,事未明指,无从察考”。

其次,就蔡标在云南提督署任吃空饷及其与崧蕃“翁婿”关系做了回奏。一是蔡氏在云南提督署任时期并无吃空饷,以及勒索、摊派弁勇之事。二是关于蔡标与崧蕃间的“翁婿”关系。丁振铎称,崧蕃正妻在崧蕃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到任云南之前便已去世,其妾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

①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310.

②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327.

③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310-314.

病故。同时,蔡标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十二月才交卸提督篆务并回到省城,双方眷属“从未谋面往来”。认为此事为“肆意妄捏,不待办而自明”。

复次,就冯子材参奏蔡标及崧蕃保奏蔡标的彼此矛盾行为,丁振铎也做了调查。丁氏称,蔡标能任开化镇总兵之职,系其“随同前督臣岑毓英剿办回逆,屡著战功,得膺此职”。在署理云南提督时,虽“无甚政绩”,但“地方亦均获安静”。“乐里教案”后,“粤匪窜扰滇境”,蔡标“迭据督同各营斩擒游匪至数百名之多”,使地方得以安宁。蔡氏有此功绩,冯子材仍要参劾,其缘由在于冯、蔡二人早有矛盾:其一,蔡标曾署理云南提督,但“交卸提篆时,与提臣(指冯子材,引者注)亦有微嫌”。丁振铎未提具体详情,但应是署理和实任之间矛盾心结一类之事。其二,冯子材上年秋间巡阅至广南,因两部弁兵“齟齬生衅”,因而“媒孽其短”。此外,丁氏还称崧蕃保奏蔡标,是因蔡氏“营务夙娴,忠勇素著”,但又与冯子材“各有意见”,故以“令其请咨北上调停”。事实上是为了避免蔡、冯二人矛盾激化,实“具有苦心”,并无“所为袒护”。

最后,丁氏陈述其处理建议。称蔡标“被参各款,均无实据缘由”,唯其“身膺专阃”,其“弁勇竟有私自嫖赌打降”等事,虽非有心纵容,但“营规不肃,约束不严”,应“交部议惩”。崧蕃查明“实无袒护”,所参“系属凭空诬蔑”,应请“毋庸置议”。对此,朱批言:“蔡标着交部议处,余依议”。

此外,丁振铎还另附夹片,就冯子材参奏崧蕃关于云南善后局、营务处管理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奏。丁振铎称云南设善后局、营务处由来已久,并非崧蕃任内设立。“军兴以来,一切筹防善后报销事务繁多,非设局清厘,无从核办”,故设立善后局;“边务防营事理亦极繁重,非设局稽察,难资整饬”,故设营务处。这两个机构“各省皆然,势难裁撤”,并且它们凡事皆“禀承督抚臣批饬遵办”。同时,各防营管带向由督臣商同抚臣“会札迳委”,间有“由处局及提镇指名保请委充者”,亦非概由处、局遴选。每营哨弁的委任等,概由营官自行禀保,再禀由营务处“详请给委”,并无专由营务处“迳自委充情事”,而善后局则“向不与闻”。冯氏之奏,应“请毋庸置议”。但建议以后“各营哨弁既概由营官自行禀保,无需转禀营务处。”^①

针对冯子材弹劾崧蕃“侵蚀军饷,捏报裁营”一事,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七日(1900年5月5日)谕令丁振铎对此展开调查,要求丁氏“据实具奏,毋稍瞻徇”。^②对此,丁振铎于二十六年十月二日(1900年11月23日)向清廷复奏此事。

丁振铎表示:云南“教案迭起,筹备边防,数月于兹,不遑昕夕,兼以提臣参案络绎而来,逐件委查,均须时日”。云南本已面临各种内外难题,而提督不断参劾总督,处于其间之巡抚应接无暇,“提臣参案络绎而来”之语,既是丁氏陈述调查迟缓的客观原因,或也是其内心情感的间接表达。丁振铎称冯子材弹劾崧蕃以已裁的腾永、临平两中营名义侵占军饷之事,虽然是“原为事须求实起见”,但此中详细则“有非提臣所能深知者”。隐含间接指责冯子材对事情前后经纬不熟而贸然弹劾之意。丁氏称,腾永中营及临平中营创设时间可追溯至王文韶督滇时期,当时王文韶将迳南开临营、迳西腾越营分别裁并改编为临平及腾永前、后、左、右、中五营。其中,临平中营由临元镇兼带,腾永中营由腾越镇兼带。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间,崧蕃“访查两营兵勇有不实情事”,其时又有增设水军、土兵及督抚亲兵,以及增加提、镇办公津贴等事宜,因经费一时无从筹措,遂将临平及腾永两中营裁并。而彼时云南各司道官员屡有新旧交接,故遗漏而“未将裁改情由详请奏咨”,而崧蕃又因“该两营营饷系归试用,亦未据实更正”,遂以致一直因循未报。丁振铎称:“窃思兵饷钱粮,攸关帑项,原不容丝毫隐混,特以滇居边瘠,协拨久虚,库储奇绌,所有一切应办事宜,势难额外加增,不得不就中筹画挹彼注兹,为一时权益之举,此种艰难窘况,笔难罄述”,若指“变通为侵蚀,则天下无可辩之事矣”。称赞崧蕃“履任以来,整顿经

^① 云南巡抚丁振铎片(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4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04.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8.

营,不遗余力,迭次遵旨裁兵减饷,煞费苦心”。并表示,其与崧蕃会奏时“亦未将此案商请详晰陈明,同有疏率之咎,相应请旨一并交部议处,以警将来”。朱批称“崧蕃、丁振铎等均着交部议处,余依议”。^①从奏折行文可以明显体会出,丁振铎对冯子材的弹劾颇有意见,其自请与崧蕃议处,也是一种态度。清廷中枢也认可了丁振铎的调查,所谓交部议处,在当时之情境下,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不了了之。观察丁振铎向清廷中枢复奏冯子材参奏蔡标及崧蕃的调查,其态度十分明确,皆认为弹劾失实,且为崧蕃、蔡标作了辩护。丁氏之表现,既是基于其调查情况的陈述,而其相关表述之深意,实在于维护云南地方主要军政人物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前者,丁氏更着意于维护云南地方秩序的平稳。一方面,清朝在甲午战败后虚弱之表象已呈现于世界,列强对清之侵逼日深,加重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清廷中枢帝、后派系纠葛日趋激烈,各方政治人物之言行自必慎重。崧蕃作为一方大员,其位自尊,而其又属满族,且为世家,与中枢关系深奥,而他又奉旨进京面圣,政治走向错综复杂。此时,云南作为边疆省份,又面临法、英列强的觊觎。作为地方大员,既要在复杂的派系纠葛中维持其自身政治权势,又要确保地方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宁。在某种程度上,实属不易。而冯子材在中法战争后声名大振,也不得不关照其态度。基于诸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丁振铎对崧蕃、冯子材之间的纠葛,尽量采取了调和的方式,避免矛盾激化而引发各种不稳定因素。丁氏本人自请处分,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平衡双方的政治态度。事实上,光绪帝的朱批之言,皆认可了丁的政治考虑。然而,云南军政人物之间的冲突并未因丁氏的复奏而告一段落,很快冯、丁之间也产生纠葛。

四、应对庚子勤王的不同思路:冯、丁关于出兵北上的见解

崧蕃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12月28日),得知清廷中枢批准其进京陛见并由巡抚丁振铎兼署总督的消息。经过准备,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1900年2月12日),崧蕃正式“交卸督篆”,并于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1900年2月27日)由滇起程北上。^②此后,丁振铎兼理总督事务,职权上与冯子材的交集日多。其时,伴随义和团运动不断发展,中外形势日趋紧张,丁振铎与冯子材之间围绕支援京师与保卫云南、主动出击与坚决防守等产生了不同的应对思路。

1900年以后,义和团组织向京津发展,京畿形势日趋严峻。6月10日,慈禧命端郡王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③,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慈禧既不愿意和团的发展危及其统治,又对列强对其权位的态度极度反感,在主战派的支持下,于农历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向列强宣战。^④而早在宣战前4日,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900年6月17日),清廷就以“京城内外扰乱已极”为由,谕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根据各地“兵力、饷力”,挑选得力将弁统带数营军队“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谕令还专门称“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⑤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6月20日),清廷表示“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谕令各省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盼之至”。^⑥显然,与列强开战在即,慈禧急需各省派兵支援,且心绪迫切。

关于庚子事变中清廷中枢的派系博弈、央地关系,学术界讨论众多,此处不再赘述。^⑦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因清廷要求各省派兵勤王,云南自然也在其中,丁振铎与冯子材的应对思路则完全不同。光绪

^①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2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201-204.

^② 云贵总督崧蕃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4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839.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2.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1.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5.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0.

^⑦ 如桑兵、马忠文等对学者对此均有研究。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1900年7月1日),清廷再次向各省发出要求派兵入京的谕令,云南发给了冯子材。在谕令中称,现“中外开衅,畿疆待援孔亟”,要求冯子材“统带数营,迅速来京,以备调遣”。^①清廷中枢要求冯子材率部入京,有其深意。冯子材在中法战争中因镇南关大捷而声威大震,此时正是中外战争之际,冯之声威对清廷颇有助力。清廷自身就言:冯子材“威望素著,为外人所震慑”^②。不过,此时云南也面临严峻考验。前已述及,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五日(1900年5月3日),正值北方义和团运动不断发展之际,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私运军火并强闯蒙自海关,酿成中法交涉事件。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900年5月11日),方苏雅等人到达昆明后,又在厘局查验行李时“率领多人各携快枪”入局,将军火抢运入城。方苏雅此举,使地方绅民“群怀忿恨”;在交涉过程中又“一味呵喝”,又威胁若昆明民众前来骚扰即开枪“打退”;此后,又称自己奉法国公使之命将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1900年6月10日)带领法国路工、教士回越南。对此,丁振铎认识到方苏雅“意在激衅,恐去有后言,几为滇省后患”,试图“预先筹措”而达“先弥现衅,以尽滇责”之效。然而,昆明坊间则传闻法人去后“势将加兵,不如拼死”,致群情激愤。十四日当天,昆明万余民众聚集焚抢各处教堂,造成教案。昆明民众的行为打击了方苏雅的嚣张气焰,后民众虽为丁振铎等地方官绅开导解散,但迫使方苏雅推迟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才得以在云南当局保护下起程回越。在这一交涉事件中,丁振铎认为“此次肇衅,实由方领事一人”。在处理中,丁氏开始于“军火执约坚持”,是“冀阴平众怒,弥息祸端”。但发生民众聚集攻击法国教堂等激烈行为后,丁氏又恐法方“有心寻衅”,故一方面派兵弹压民众,一方面又派兵保护方苏雅等人离滇,希望以此让法方“毋使借口”而平弥争端。方苏雅临行前表示离滇到越南后,“必不开衅,仍敦和好”;抵达越南后,方苏雅也称:“滇督保护平安,法兵毋入滇界”。^③然而,形势虽表面暂时缓和,但云南内外压力十分沉重。

丁振铎因应付“昆明教案”正焦头烂额,而清廷中枢又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6月20日)谕令各地,称“中外衅端已成”,各省督抚应“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等事宜“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④很快,清廷中枢又要求各督抚“迅速筹兵备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⑤。措辞颇为严厉。一方面,云南本身面临法越当局陈兵滇越边境的压力,^⑥正忙于中法之间的折冲,并时须加强边防以免不虞,且存在财政等诸多难题;另一方面,又接中枢要求派兵援助京师。如何应对,颇属不易。

不论是北上援京,还是处理云南边防,都面临诸多困难。经过权衡,丁振铎采取陈述客观实情并沉着应对的策略。他既向清廷中枢表达忠诚之意,又陈述云南的实际困难与打算。丁振铎称:“窃惟强邻虎踞堂奥,轻侮中国久矣,朝廷已忍无可忍,而彼犹逼迫日甚,驯至民教成仇,祸端不可遏制。达权应变,不得不然。”慈禧对外宣战,朝廷内外认识并不一致。丁氏这一表态,支持了慈禧的宣战行为,但“达权应变”又隐含多种含义,既为中枢应变提供台阶,也为其自身的“达权应变”留下伏笔。丁氏较准确地观察到庚子事变的内外经纬,观察到清廷对宣战准备不充分及决心并不坚决,故言“惟此次变生仓促,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1.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4.

③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6:321-327.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0.

⑤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7辑[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6:759.

⑥ 方苏雅等人已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1900年7月5日)离开云南,但十七日(7月13日)仍接刘春霖报告,称“越南总督都梅调兵数千,填札保胜、龙腾一带,逼近滇境”。见: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6:327.

万不得已而致决裂之苦衷,彼族非不深悉”。建议“朝廷先以拒战为应急之图,徐以坚守待转圜之至”,此因“事机瞬息百变,亟宜权衡缓急,苟不使群相猜忌之国激而为合一图我之谋,似于战算间术均有可操”。转而则称,此须“仰赖庙谟独伸睿断,有非臣工纷纭聚议所敢上淆宸听者”,表达对慈禧的尊重。继则言其态度,“叠奉谕旨,五内如焚,亟思投袂北行,整军入卫”。然而,客观情况则是“无如天时、人事内外交乘”,表现在:其一,滇省本身危机重得,既有“保守疆土之旨”,而“边圉重责”使其不敢擅离。其二,欲遵旨选派精锐数营飭令星夜赴援,但“近省一带,悉无大枝劲旅,势难克日成行”。其三,若“迅速挑募调集”,又“非月余不能拔队”。其四,滇省距京七千余里,“兵队赶至津畿,又在数月以后。非独缓不济急,且恐兵力亦疲”,“南北异宜,不足以资捍御”。其五,存在“边防吃紧,军械难筹”等种种艰虞。显然,丁振铎所论是客观情况,但毕竟与清廷旨意相背,故又言:“然以京师根本重地危急至此,忝为臣子,手握疆符,竟不能稍展寸筹,仰纾宸廑,抚心愤疾,诚有万死莫赎者。虽目前力实不逮,不敢以虚词塞责,而北望朝廷忧煎弥切。容续审事势如何,滇省兵衅缓急,亟当通盘筹计”。其意诚惶诚恐而态度又已十分明确。丁振铎进而阐述了云南边防的紧迫情况:一是自缅甸、越南失陷后,西南边疆“门户洞开,犬牙交错,处处可以阑入”,而英、法以接壤为利而“兢起垂涎”。这是总体形势。二是“昆明教案”发生后,法国欲以此为借口而要挟云南在路矿等权利上让步。“明知滇民多疑轻愤,借此挑衅生端,为改废约章,肆所欲为之地”,此后“教案、路工层层挟制,不难明执保护之说,阴行占据之谋”。三是法国在越南的河内总督都梅已调遣法军5营、开花炮队2营,自称“来滇自卫,剿办强民”,并且在北坡、甘核、南坡、龙腾一带“添扎法兵数千”,陈兵滇越边界“日夜演炮耀兵”。四是法国此时“现有北事借口,或竟以兵端已见,无可商论为词,迨自派兵过界”,则云南方面要保守疆土,“不得不设法劝阻”,若劝阻失败,“不得不竭力拒守”,双方即有开战风险。五是英国对云南虎视眈眈。“英之谋滇缓急,视法横狡虽逊,执拘弥坚。法如逞志于南,英岂独甘退让,即不乘机袭取,亦将援例要求缅甸界务”。六是云南本身军队力量较弱,且防线甚长、分布零星,御外镇内均感吃力。“滇省频年节饷裁兵,防军本极单薄,边防分布二千余里,虽皆择要驻扎,终觉队伍零星,抽练调练,奔命实疲,换防填防,周转无策,不特御外侮力弱堪虞,即镇慑土匪、保护洋教亦苦不能敷用”。七是云南军械落后。“惟军械缺乏,局储半皆窳钝……滇省虽民心尚固,陆险可守,而以血肉之躯、朽钝之械,与快枪利炮相持,即舍死抵御,焉有把握。”^①

丁振铎作为地方大员,久经官场磨炼,对清廷中枢的决策及运行机制十分熟悉,对中外时局发展的把握也较为准确,于事情的轻重缓急及督抚职责的分析颇有条理。丁氏此奏,既表达了心忧朝廷的忠诚之意,其所述情况于情于理又均属客观,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应变能力。对于丁氏此奏,朱批称“另有旨”。^②未明言态度,但实则默认了丁氏之议。

丁振铎关于派兵勤王的观察与应对是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900年7月10日),清朝就改变了此前要求冯子材迅速带兵北上的计划。是日,清廷谕令:“前有旨令冯子材带队北上”,但云南“边防亦关紧要”,故“即著勿庸来京,以资镇守”。要求冯子材“务当整饬戎行,慎守边陲”,如敌人“有意开衅,即着迎头痛击,毋得观望迟误”。^③清廷中枢的这一谕令,从另一维度表现了前述丁振铎应对的得当。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1900年8月1日),针对丁振铎的意见,清廷谕令称“云南边界逼年缅越,英法窥伺已久,现当有事之秋,难保不乘机侵犯”,正式同意丁振铎按其所拟办法

①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759-763.

②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764.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4.

“极力防范，毋销疏懈”。^①

而与丁氏这一稳健的行为相比，冯子材是力主带兵进京勤王。在清廷谕令其不用带兵入京勤王后，冯子材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900年8月13日）再次上奏，称清廷应“专于主战，勿为和议所摇”。表示自己“久悉洋情”，对敌人“见惯不畏”，愿意“改防为战”，行釜底抽薪之计，并自募两万人分道进攻缅甸、越南以“救北京之急”。^②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1900年9月15日）接到两宫已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1900年8月11日）“西巡”的准确信息后，他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1900年9月18日）仍然向中枢去电，称英法附和诸国“肆意要挟”而“全队北上”，“缅越实已空虚”，故其前拟“亟取缅越，坚其回顾，北路自然解围”之计是可行的。但目前两宫危急，“自应先其所急而后图其边防”，拟“率前情自募二万人先行入卫，所有饷械应由云贵川广各省迅筹”。冯子材坚持其“惟一意主战，故卒成中兴盛业”的一贯认识。对于冯氏所请，朱批仅言“另有旨”。^③冯子材主战之意甚浓，清廷中枢对列强虽然宣战，而战和又举棋不定，自然难以给冯氏准确答复。不过，很快清廷就表示“现在筹饷维艰，添募大枝兵勇亦非易事”，并以“云南向赖四川协济”为由，令冯子材与兼署云贵总督丁振铎、四川总督奎俊商明四川可增加的协饷数量，据此“就饷练兵”以巩固边防，不必“远道前来”。^④这一谕令，正式结束了冯子材带兵北上勤王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结束了冯、丁之间围绕主动北上救援和坚守云南的分歧。

观察丁振铎、冯子材两人应对清廷谕令勤王的不同表现，虽然冯氏对丁氏颇为推重，言“署督臣丁振铎公忠体国、藩司李经羲才识远大，共体时艰，期挽危局”^⑤，但事实上两人的应对意见实为相反，且丁振铎对冯子材的“不顾大局”之举是颇有意见的。

五、结 语

清末云南地方军政三大要员在新政前夕的复杂纠葛，正是当时清朝内外复杂政局的一个缩影，表现了晚清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央地关系急剧变化及西南边疆地方政治秩序不断窳败的景象，隐蕴着复杂、深刻的历史内涵。

清廷中枢虽然维持着对地方权势结构的控制，但已无力从根本上整顿已经日益失衡的社会政治秩序。不论是表现于清廷中枢的帝、后之间派系纠葛，还是前述云南地方军政三大要员，即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云南提督冯子材之间的弹劾、调解与分歧，事实上都是清朝统治根基日益动摇、统治层内部不断分化、央地内外各方矛盾不断加剧并交织景象的突出表现。观察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清廷中枢虽然要求丁振铎对冯氏弹劾崧蕃一事进行调查，但事实上是一种表面的政治态度或政治姿态。姑且不论冯子材的弹劾是否真如同丁振铎的调查存有失实之处，客观上清廷中枢此时实无余力应付西南边疆的各种复杂危机及云南地方政局的纠葛。其处理态度，主要是一种调和，而丁振铎的调查结论，事实上也正符合清廷的希冀。

19世纪50年代地方督抚势力日渐上升，是晚清央地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表现。但从前述崧蕃、丁振铎、冯子材三方之间的纠葛可以观察出央地关系的几个彼此矛盾但又共存的现象：一是地方督抚势力虽然上升，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中枢的控制。不论是冯子材的参劾，还是丁振铎处理“昆明教案”及对冯氏参劾情节的调查，乃至庚子事变中冯、丁的态度表现来看，地方总体上仍然要服从于清廷中枢的政令，并且其个人升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38．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479．

③ 云南提督冯子材（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838-839．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17．

⑤ 云南提督冯子材（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7辑[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838．

迁等也主要以中枢的意见为主。二是清廷中枢虽然仍掌握着道统、政统等关键性统治要素,但对地方政局的控制则主要依赖于派系之间的平衡之术。冯子材参劾崧蕃,虽然有不实之处,但清廷同意崧蕃进京陛见,即是准备将其重用。在丁振铎的回奏未到之时,清廷已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1900年8月4日),允准到京的崧蕃“加恩著在紫禁城内骑马”^①,表现了重视之意。事实上,丁振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未曾对云贵实缺提镇出具考语时,直接称冯氏“年逾八十有四,神志不清”^②,这或是实情,但也表现了其对冯氏不断与督抚纠葛的不满。然而,清廷中枢虽然未同意冯子材弹劾及出兵北上勤王等意见,但仍对冯氏给予关怀或笼络。这种平衡之术,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了清廷中枢的“失据”。

列强的侵逼不仅使西南边疆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对象,不仅影响到清王朝内外政策的形成及政策实施的效能,也影响及于清廷中枢的政治决策乃至政治派系的起伏。中法战争期间,以慈禧罢黜恭亲王奕訢引起的甲申易枢,即是边疆问题引起中枢派系起伏的重要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开启了近代“边缘”影响“中心”的政治现象。清末新政前夕,西南边疆的中外交涉并未减少,反而日益频繁,成为影响西南边疆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清末新政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我图存的政治变革,亟须坚强的领导中枢和稳健的各地方力量支持。前述内容,呈现了清末新政前夕云南地方政局秩序失宁、各方之间博弈并彼此牵制、地方与清廷中枢的复杂互动、中外交涉的变化等多元景象,都影响着西南边疆区域的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及社会政治结构的平衡。清廷中枢力量的“弱化”、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③ 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Clash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Leadership in Yunnan and Its Impact on the Eve of the New Deal in Late Qing Dynasty

DUAN Jinsheng¹, CHEN Ziniu²

(1. *Scientific Affairs Department,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4;*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4)*

Abstract: In the run-up to the New Deal in late Qing Dynasty, Feng Zicai, Yunnan Commander in Chief, Song Fan, Governor-General of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and Ding Zhenduo, Governor of Yunnan, who were under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entangled with overlapping mandates, ended up in overt conflicts over separation of power between government and armed forces in Yunnan, as not only manifestation of the imbalanced state and local power of Qing Dynas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but also laid bare from another dimension the facet of increasingly acut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rds in Yunnan. Facts exposed in those clashes, including weakening central authority, intricate central-local interaction, arguments in the government-military high rankers in Yunnan, and in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ilitary presence of the province, were bound to hold back the landing of the New Deal and diminish reform outcome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plications in Yunnan, a stronghold i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heralded to some extent an unpredictable and tricky future for the New Deal in the area. A deep probe into those complexities is necessary for an all-arou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al in this southwestern part of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border areas of Yunnan; conflict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leadership; Feng Zicai, Song Fan, Ding Zhenduo; local political scene

(责任编辑:杨谨瑜)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上谕档: 第26册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45.

②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 第47辑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504.

③ 这些复杂影响内容, 笔者拟另文撰述。